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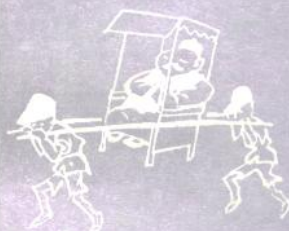
叶圣陶先生
先生



叶圣陶先生
先生



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小说论

任天石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小说论

任天石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圣陶小说论

任天石 著

出版：江苏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东台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625 插页4 字数128,6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ISBN 7—5343—0580—2

I·31

定价：2.20元

责任编辑 常烽岚

文学应当“为人生”

——序

陈 瘦 竹

二十年代初期，我从无锡农村到县城，进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读书。那是一所文史著称的学校，名师很多，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久，老师讲的是经史子集，学生写的是古典诗文，但有不少青年学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常于课外阅读所谓新文学作品，我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叶绍钧（圣陶）的短篇小说，便是我当时爱读的新文学作品。

作家为广大读者而执笔，但是每个读者并不都爱一切文学作品。读者对于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常和读者自己的经历、素养、性情和理想有关。当时我只是一个低年低的师范生，其实不懂什么叫做新文学，既没有老师来讲解，也不和同学相讨论，只是到图书馆和新书店里去乱翻，几乎什么都看。但我特别爱读叶绍钧的作品，并非完全出于偶然。象我那样一个低年级的师范生，缺乏理论素养，只能凭着一点直觉去衡量文学作品的长短，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我惊叹鲁迅的冷峻深刻，同情郁达夫的抑郁忧伤，而我更喜欢叶绍钧的朴素亲切。我觉得他所描写的人物、事情、习俗和风景，大致都很熟悉，他所发现的问题和所表达的意思都

使我产生同感。他的《隔膜》中《一生》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所写农村妇女的不幸命运，就是我在无锡农村所听说过和见到过的事。我在乡间读国民小学，在镇上读高等小学，见过不少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所在，那时我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常听到校友回来谈起从事小学教育的甘苦。因此我对叶绍钧表现小学教师生活的小说，特别感兴趣。他还写到镇上和乡间的风光，因为苏州和无锡相距不远。例如小河、木桥、农田和村舍，就和我所见到的毫无分别。我从乡镇到县城去读书时，开始坐航船。吃过晚饭，我提着行李，夹着席子，走进舱里，在人缝里挤得一席之地。天黑了我就睡下来，听着单调的摇橹声，有时还听到船夫的山歌声，象睡在摇篮里似的一路摇晃着进入梦乡。第二天一清早，航船就摇到了无锡。不多几年，就有了小火轮。这种小火轮拖着大驳船，半天就能走完这七十多里的水路，在夜间航行的木船从此绝迹。叶绍钧在《外国旗》里提到航船，在《悲哀的重载》的开头就写着小汽轮拖着一艘“常熟快”，使我读后引起许多联想。他在《潘先生在难中》和《外国旗》中侧面描写的一九二四年江浙军阀混战，也使我产生不少感想。

我所以爱读叶绍钧早期的小说，当然并非因为他写了我所熟悉的生活，而主要在于他引起我的许多感想，使我对生活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善恶。题材新奇的作品，固然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这类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还是要看作家对于他所描写的生活是否有独特的感受和新颖的思想。在“五四”运动前，一九一九年一月，北京大学生组织新潮社以后，出版《新潮》杂志。三月，经顾颉刚介绍，叶绍钧加入该社，并开始写白话小说在该刊发表。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谈到新潮社小说家时，指出他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终极的目

的”。鲁迅特别强调：“叶圣陶有更远大的发展。”在“五四”前后，叶绍钧还发表不少论文，说明他对教育、妇女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改革意见。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写实主义，叶绍钧是该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短篇小说是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作品，成为该会早期的杰出代表。

文学艺术作品，无论采用什么创作方法和采取什么表现手段，写实或写意，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甚至其他什么主义，在根本上都必须“为人生”，如果只为渺小的自我或抽象的艺术，那就不会有人爱读，也就没有价值。既然是为人生，那么美和善的就应该加以歌颂，丑和恶的就应加以讽刺。一九二六年，叶绍钧在《随便谈谈我的写作》中说：“某一事象我觉得它不对，就提起笔讽它一下。”他写小说经常采用白描手法，文风朴实无华，并不高谈阔论，宣扬哲理。但他对于黑暗社会并非毫无批判，必定要“讽它一下”。由于描写对象和作家个性的不同，讽刺就有不同的分寸和意味。有的讽刺怀着蔑视和愤怒，针对黑暗现象，仿佛一刀刺出血来，令人看了感到痛快而放声大笑；有的讽刺带着仁慈和温情，对于荒谬人事，旁敲侧击加以嘲讽，令人看了觉得很好笑而不免悲悯。叶绍钧所谓“讽它一下”，显出后一种风格，如以他的名篇《潘先生在难中》而论，其中含有幽默的特色。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连年内战，无恶不作，人民切齿痛恨。作家对于这些罪魁祸首，理应口诛笔伐，但是由于生活不熟悉和环境不容许，只得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揭露。洪深在《赵阎王》中通过一个士兵逐步变坏的过程，田汉在《苏州夜话》中通过一个画师家破人亡的悲剧，揭露军阀内战的罪恶。叶绍钧在《潘先生在难中》，以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事为背景，表面上嘲讽一个小学教师，实际上却是对制造内战的军阀的针砭。内战不仅是军阀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弊病也使人一目了然。上海有租界，城镇有教堂，这是

“洋人”的世界，军阀怕洋人，所以一旦内战发生，官僚富户可以躲进租界，教民可到教堂藏身，至于广大人民只得任人宰割。军阀固然可恶，投靠“洋人”，实在可耻；应该走什么路，这是一个问题。潘先生是江南一个小城里的小学校长，胸无大志，卑微自私，生逢乱世，处境狼狈，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怜的角色。潘先生家道小康，否则无力逃往上海租界，然而并不富裕，平空花一笔“逃难费”，未免冤枉。他没有权势，所以只好自己带领妻儿去奔走。他有些书呆子气，所以迂腐笨拙。他目光短浅，随遇而安，他平庸软弱，分明被人害得好苦，还要歌功颂德。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辜受罪，不能完全怪他庸人自扰，多少值得我们同情，而对他的同情，就是对军阀的控诉。

叶绍钧熟悉小学教师，潘先生这个形象很有典型意义。

叶绍钧首先描写潘先生带领家小逃难到上海，走下火车，在租界里找旅馆住下来，情节虽然简单，却是叫人啼笑皆非。军阀混战，既然无力反抗，自然只得暂避一下，但象潘先生这种穷教师，居然要学“大人物”的榜样，外强中干，就有某种喜剧性。

迂腐执拗，在拥挤的车厢里一家四口居然手拉着手排成一字长蛇阵，真是不识时务。叶绍钧刻划这个性格，可谓入木三分。

“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反复叮嘱家人，互相紧握着手不可放开，

“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作品的喜剧效果，不在作家的夸张笔墨，而在“如实地写”出喜剧性人物的特征。叶绍钧写潘先生一家人手牵手，“犹如一条蛇”而不是犹如一条龙，这是因为龙能吞云吐雾，雄伟矫健，而潘先生这一家人，弱小孤零，只能在人缝里乱钻，所以“犹如一条蛇”。

但是潘先生这“一条蛇”终于尾大不掉，为了保全七岁儿子的胳膊，自己先失约放了手。叶绍钧接着描写他挤在人堆里进退不

得，“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他朝前叫喊，后面的家人怎能听到？这里既写车上旅客拥挤，而潘先生的狼狈相也就活现在纸上。

潘先生患得患失，情绪起伏不定。他走出车站，发现家人失散，急得流出眼泪，找到以后又喜出望外。在雇车去租界时，他“微微昂起了头，似乎增加了好几分威严”，摆出一副“老上海”的派头。小孩看到印度巡捕有些害怕，潘先生安慰道：“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这是诛心之论，一句话暴露了潘先生的卑微的灵魂。

潘先生虽然逃到上海，但仍有寒酸相。然而他能自得其乐，叫茶房“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他向夫人谈起有两件乐事，笑迷迷地说：“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正当他得意忘形之际，他发现旅客须知单上写着房价“不折不扣两块！”吓得他“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

潘先生下火车到旅馆，情节十分简单，然而叶绍钧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叫人觉得实在好笑，有时只是苦笑。叶绍钧“讽它一下”的艺术，一开头就非常动人。

潘先生毕竟是一个小人物，在兵荒马乱中，为了保全自己，平白生出许多烦恼。为了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他逃难到上海，为了保全一家人的饭碗，他又不得不单身回家去准备开学。潘师母这时有生离死别之感，潘先生安慰她说：“我自己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叶绍钧正是抓住这一句话，继续对他进行讽刺。他唯恐教育局长将他革职，便急忙印发开学通知。但他最关心的当然是他的身家性命。他丝毫不顾女仆的安危，一心只想在当地找个藏身之所。到上海的交通已经断绝，他顿觉得“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起，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这种情境确乎有些可怜，但只怪他庸

人自扰，未免有些可笑。至于他向红十字会职员多要一面旗子和几枚徽章，则是更加可笑。如果说逃到上海租界可以暂避军阀的炮火，红十字会的旗子和徽章谁都知道毫无一点作用。然而在叶绍钧的笔下，潘先生却觉得那红十字的徽章，“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不仅如此，潘先生还觉得他给远在上海的孩子们所代领的那些徽章，“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了一种新的勇气。”叶绍钧的讽刺笔墨，力求严肃，不尚夸张，深刻地写出喜剧性人物的真情实感。

战事终于临近，潘先生只得又从家里逃到“外国人的红房子”里去。他想不到教育局长带着一个同事和表弟早已先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三令五申要求如期开学的教育局长尚且如此，我们何必苛责潘先生呢！内战虽没有打到潘先生的家乡，但是士兵到处拉伕，居民惊惶万状，以及潘先生的妻儿被阻隔在上海，这些都使潘先生感到忧闷。二十多天以后，战事停止，潘先生想到应该开学，便到教育局去。局里正忙着给那军阀扎牌坊写匾额，歌功颂德。大家请潘先生执笔，他“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意味”。他写的时候，“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枪，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叶绍钧在讽刺潘先生的奴性时，并没有写他如此麻木不仁而至真心歌颂军阀混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象潘先生这样既可笑又可怜的小人物不在少数。透过这个喜剧形象，我们看清了那个黑暗社会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叶绍钧虽然只是“如实地写”，而没有发什么议论，但它“讽它一下”的深刻含意却使人领会无遗。

叶绍钧短篇小说的题材和风格极其多样，但《潘先生在难中》的笔调足以见其一斑。写作短篇小说，贵乎经济。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编辑访问叶圣陶时，谈到短篇小说，他强调“简练些好，紧凑些好”，并以朱自清的《背影》和鲁迅的《在酒楼上》

为例，说明无论描写面貌服饰、细节和对话，都很经济。叶老非常自谦，其实《潘先生在难中》的写法，就很简练紧凑。他并不先写潘先生一家为何乘火车到上海，只写下火车到车站的拥挤情况，而后再写潘师母一句埋怨的话：“早知道这样子，宁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了！”这一句话，具有画龙点睛之妙。到上海租界住定旅馆以后，小的孩子先要“火腿汤淘饭”，大的孩子吵着要“吃大菜”，都被父母喝住。这就将潘先生不太穷困而又不很富裕的经济情况介绍得很清楚。

丁玲在为《叶圣陶论创作》所作《序》中表示，她非常推崇叶老的文学见解。她说：“我几十年的一点经验，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点体会和总结，叶老几十年前就体会到了。”丁玲的话说得非常真诚而中肯，不仅显示一个革命作家虚怀若谷对于前辈大师无限景仰，而且表明她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极为尊重。叶老的文学论著对于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固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许多小说，尤其令人爱读。从我第一次读《隔膜》起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我有时还看叶老的作品，觉得很有味道，这不仅使我忆起过去阅读的印象，而且有助于我了解中国的昨日和明天。我认为叶老的小说所以动人，根本原因在于他那“为人生”的创作思想。

“为人生而艺术”是我国“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态度，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并且认为文艺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如就叶绍钧等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的创作思想来说，所谓“为人生”，就是反映社会生活，关心人民疾苦，同情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关于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在中外文学史上历来就有争论。在欧洲最早的一次哲学和诗歌（文学）的论争中，亚里斯多德针对其老师柏拉图贬低诗歌为虚假、轻浮和有害的东西，强调诗歌是真实、严肃和有用的作品，并在《诗学》中指出诗歌（悲剧、喜剧、史

诗和颂歌)以各种不同方式(赞颂的、讽刺的和滑稽的)摹仿(再现)社会生活中各种人物(动作的人),其功能与价值在于陶冶人的性情。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后来所谓现实主义的萌芽。和“为人生而艺术”相对立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口号先后反对“为宗教而艺术”和“为金钱而艺术”,并非毫无进步意义,至于完全脱离现实甚至歪曲现实,那就成为消极的文艺思潮。我国早期创造社曾经提出“为艺术而艺术”,但就郭沫若的诗歌和郁达夫的小说而言,无不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只是想象更丰富而感情更奔放。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虽有各种风格、流派互为消长,但是“为人生”的文学始终成为优良传统。在“为人生”的旗帜下,作家的经历、素养、思想感情不同,作品中的题材、主旨、结构和语言各异,因而各有特色。例如在“五四”时期,叶绍钧就和其他文学研究会作家各不相同。因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所谓“人生”的观念也在变革。在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人生”就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人生”就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叶老许多“为人生”的小说都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我认为他那创作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以来,在文学理论和创作方面有不重视历史,不进行分析,醉心二次大战以后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反对现实主义,否定民族传统的现象。有人借创新之名行复旧之实,在文学上宣扬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有人以性欲为人生第一要义,不写纯洁忠贞的爱情,只写少年男女早恋,已婚夫妻各自另找对象。还有人主张文学不应该为人生,而要表现自我。其实,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家为人生而创作,其中就有作家自我,通过我的真情实感,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就显示出作家独特风格。如果离开社会实践而宣扬什么“作家主体意识”,那就会回到文学研究会所反对的“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老路上去。我们对于当代外国资产阶级

文学，应该将其创作思想与表现手法相区别，有所批判，有所借鉴，不可依样画葫芦。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就应当继承“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手法上可以吸收一些象征的、幻想的、怪诞的和荒唐的因素，其功能不是为作者自我效劳，而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到现在还爱读叶老的小说，当然此外我还爱读鲁迅、茅盾、巴金和老舍等人的小说。

我既爱读叶老的小说，也就常看研究叶老的论文和专著。我看过《叶圣陶评传》（陈辽）和《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金梅），受到不少启发。任天石同志的《叶圣陶小说论》从初稿到定稿，我看过多次，因此我更爱读。《叶圣陶小说论》这部专著是任天石同志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由我和邹恬同志指导。任天石同志六十年代初就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听过我的课，但我真正认识他，却在一九七八年暑假以前。他在大学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他虽是革命青年，但到底不是“响当当的老造反”，就被分配到广西梧州地区一个小县里去，接受瑶族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公社中学教员，到贺县县委宣传部从事通讯报导工作，前后共十年。他报考我国首届硕士研究生时，早已成家，并调往南宁师范学院任教，但他坚决报考，充分表现出他在学术上的抱负和毅力。天石为人诚挚敦厚，好学深思，不慕名利，只是埋头苦干。在写学位论文时，他以叶圣陶小说研究为题，我认为凭他的品性和气质应该可以成为作家的知音，就同意他这个选题。一般说来，一个研究者对于各种风格流派的文学作品都应该能够欣赏而且加以评论，但是如果与作家性相近气相通，真正成为作家的知音，那就可以避免隔靴搔痒，少说一些浮泛空洞的话。任天石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态度极为严谨，他的《叶圣陶小说论》中的部分章节，虽以单篇论文形式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并获得好评，常被转载复印，他并不轻易拿出全部书稿。他毕业后，留在南京大学任教，任中文系副主任，工作任务虽极繁忙，但仍

继续研读叶老小说，反复修改书稿。他这种负责精神我认为值得推崇。

叶老是我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理论著作都有杰出成就。任天石同志在他的专著中以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为背景，联系叶老的生活实践以及文学和哲学思想，运用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较的方法，突出他的小说的主题、形象和风格的特色，以及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就使这部著作具有历史透视力和审美敏感性。这部专著还有一个长处，就是作者能够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原则，深刻理解作家的原意与苦心，对于前人评论中的某些误解有所辨证。例如《潘先生在难中》，主角分明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怜的小人物，但是过去论者大都将他当作一个完全被否定的形象，丝毫不值得同情。任天石同志联系人物性格所以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作家对于人物的真实态度，认为小说对于潘先生的确是有所“批评和讽谕”。但是他说：“这种讽谕是以对他的艰辛际遇和离乱之苦的诚挚同情为基础的，是以抨击造成小人物们种种悲剧的罪恶社会为目的的。”我认为这种理解不仅符合小说原意，而又揭示出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又如关于《倪焕之》的评论，到七十年代后期，竟有人认为这个进步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是把改良主义作为他的指导思想”，甚至认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就是“通过倪焕之亲身经历的描写，深刻地否定了改良主义”。任天石同志并不同意这些流行的观点，认为改良主义有特定的时代和阶级内容，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则借以说明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改革的政治性质。倪焕之根本不是改良主义者，“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他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倪焕之的思想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令人信服地纠正了关于这个人物的各种误解。他对叶老的艺术风格深有体会，关于叶老如何借鉴外国小说的论述也能给人不少启发。

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正在编印《叶圣陶集》，这真是不朽之盛业。我想同时还应该出版研究叶老的专著，以供读者参考。因此我就乐于为任天石同志的《叶圣陶小说论》写序，并向读者推荐。

一九八七年四月 南 京

目 次

文学应当“为人生”

——序·····	陈瘦竹
----------	-----

从《隔膜》到《火灾》

——小说创作的发端时期·····	1
------------------	---

艰难世事孕育了“为人生”的“文心”·····	1
------------------------	---

用“一双透入的眼”看取世界·····	10
--------------------	----

为了追求“美”与“爱”的人生·····	24
---------------------	----

小说创作的发展时期

——《线下》、《城中》、《未厌集》·····	36
------------------------	----

视野的扩大和“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	36
------------------------	----

笔端浸透下层民众的血与泪·····	47
-------------------	----

对妇女命运的不倦探求·····	52
-----------------	----

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深入透析·····	60
---------------------	----

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中

——小说创作的新阶段·····	78
-----------------	----

与时代共同着脚步·····	78
---------------	----

血与火洗炼作家的笔·····	94
----------------	----

充满了动乱和灾难的城镇和乡村·····	107
---------------------	-----

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	116
------------------	-----

对中国小说艺术现代化的贡献·····131

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艺术革新者·····	131
---------------------	-----

对长篇小说艺术的新探索·····	148
------------------	-----

结 语·····156

从《隔膜》到《火灾》

小说创作的发端时期

艰难世事孕育了“为人生”的“文心”

叶圣陶于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九月三十日）出生于苏州悬桥巷一个市民之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为一吴姓地主管帐，全家靠父亲的非薄收入维持着清苦的生活。旧世道的阴云一次次地笼罩着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也在青少年时代叶圣陶心灵上最早投下了那个时代的阴影。一九〇〇年，他不满六岁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读书，一九〇七年进公立小学，一年后转入苏州公立小学。一九一一年中学毕业后，他的一些同学如顾颉刚、俞平伯等得到到北京等地入学深造，但他因家境贫寒，虽本人才学出众，也无法继续升学。一九一二年二月，虽然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青年，便已过早地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开始在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学校充任二年级教员。同年十二月，友人章彦驯致函叶圣陶劝其赴美留学，叶对此当然向往，但家贫父老，无法应承。一九一四年，顾颉刚父亲顾柏年先生因器重叶圣陶文才，提出资助他到北京上大学，叶圣陶也因不能摆脱家务重担，虽此机会极为难得，最终也不得不忍

痛放弃。本来，“他的性情，原是与小学生聚得下淘的”^①，但世态炎凉使他失去了这一职业兴趣：“做教师之无味，不在学生之不好乃在同事之讲不落言话”，“‘调查视学之’‘象煞有介事’”，使他“一肚皮的不高兴”^②，甚至灰心失望想去作工匠，后于一九一四年被排挤去职，在家中闲居半年有余，心情十分抑郁。一九一七年，叶圣陶应旧日同学、后被叶圣陶誉为“足具真诚能实行的教育家”^③的吴宾若之邀，与好友王伯祥一道到吴宾若任校长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在角直镇）任教。在角直期间，由于经常“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同方法”，而“同事又是几个熟朋友的缘故”^④，他与同事们一起，饶有兴味地自编课本，创办农场、书店、博览室，建造礼堂、戏台，举行恳亲会、同乐会、远足郊游等，实施教育改革的主张。一九二一年吴宾若惨死于车祸，叶圣陶至为悲痛，而校中同人中却有人为“逐鹿”校长勾心斗角，倾轧竞争，叶无法忍受，便有离去之意。此时恰逢上海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慕叶圣陶文名聘其任教，叶遂于同年暑假后到上海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在此结识了同被邀请任教的朱自清、刘延陵、周予同、吴有训等。后因中国公学旧派教员煽动学生闹起风潮，叶圣陶等受到攻击，中学部停课，风潮结束后，叶辞职回到苏州。不久，朱自清赴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并介绍叶到该校替代一位中途离去的国文教员。叶在杭二月余，寒假前又复归苏州。一九二二年二月，他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聘请，与郑振铎等结伴到北京，任北大预科作文课讲师，继因北大欠薪，妻子待产，复又南归，因妻子胡墨林产后忙于家务不能继续在角直

①叶圣陶1911.12.22.致顾颉刚信，见《隔膜·序》。

②同①。

③叶圣陶：《未厌居习作·心是分别不开的》。

④叶圣陶：《未厌居习作·过去随谈》。